

分析同时拥有了戏曲作为舞台演出艺术的情境，如是，其独特的语词表达方式、修辞特点，以及与格律、科介的关系等，均进入审视的范围，其所富有的文体和文化凝结也一一得以诠释。而借助跨文化、跨文体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从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和小说、诗文等维度审视戏曲文本，不仅有助于文本的解读，也为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载体和信息表达方式。这是戏曲文本阐释的独特创获。由是，戏曲研究领域得以拓展，研究内容和理论方法都呈现出融合、交叉和综合的特征。其结果是，戏曲研究不再具有盲区，地方戏曲、民间戏曲和宫廷戏曲等的研究状况都呈现出良好的态势，雩戏、目连戏和其他声腔等的研究得到充分发展，活态戏曲已然成为非遗文化的重要内容。多元的丰富的戏曲史格局已基本确定，由此而来的戏曲史研究和编撰将取得更为丰厚的成绩，通史、断代史乃至专门史各呈特色、各具成就的时期即将到来。

就戏曲理论的建构而言，在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后，从狂热的“拿来”、任性的“借鉴”到当下的理性思考，中国的古典戏曲理论早已开始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和短长。意境说、虚实论和文辞、音律等问题，依然是内蕴丰富的话题，也还是新话题生成的基础和前提，相关探讨饱含建构中国戏曲理论体系的话语指向和学理诉求；已然开始的与西方理论的真诚对话，强化了这种理性而自信的学理意识。在纷繁的理论话语中如何把握好中西两种文化、思想和方法，让戏曲理论始终运行于中国独特的美学观念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民族特点中，又以独特性立足于世界戏剧之林，仍然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需要探索的问题。任何理论建构或许都是有瑕疵的，但这正是时代赋予理论的宝贵机缘。

改革开放四十年，戏曲研究领域成就非凡，但问题依然存在。比如说戏曲研究的从业者始终处于不太稳定的状态，老一代学者渐行渐远，中年学者的学术引导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激发，新生力量的成长亟待引导、培育等；比如说戏曲研究难以形成新的学术热点，没有引领性话题以有力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比如说戏曲理论和戏曲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呈现出“两张皮”的疏离状态，文献发现的成绩并没有带来相关意义研究的理想推进，等等。也就是说，戏曲研究领域依然面临着如何创新、怎样突破的巨大困惑。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开端，是由思想解放拉动的，反观当下却不容乐观。受制于固有的思维模式、体制机制障碍乃至惰性学术观念，戏曲研究并未达到应然的理想境界。有一句话，或应是激励当代学人奋力一搏的最强之音，那就是“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句《国际歌》的歌词永远熠熠生辉，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其中蕴含的追求学术自由、思想创新的指归，也足以激发蕴积于心的动力，让学术的未来可期。如是，学术选择将逐渐褪去被动或被迫的色彩，将个体打造成为“公器”而生存的自由思考者和能动实践者，并内化为学者的自觉学术追求。以一人之心呈现千古之心、天下之心，以文本解读和理论阐释彰显世态人情，达成格物致知的人生目的，毕竟是学术研究的终极指向；而淡化这一点，甚至是回避这一切，文学何以成为人学，文化何以成为有温度的文化？人文情怀怎能不淡化？所以，“让思想冲破牢笼”，是当下学术研究的关节之所在，也是学术研究回归人文之本的路径所在。

对古典文学研究发展趋势的两点认识

刘 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古典文学研究在既往的四十年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其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应

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充分利用新文献。此所谓新文献,既指方兴未艾的出土文献,亦指域外汉籍。此类研究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出现和海外交流的日渐便捷,已经蔚然成风。就目力所及,黄德宽近期发表的《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卞东波近期发表的《域外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景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16日),皆可视作最新的示例。

二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古典文学。《文学遗产》在这方面的贡献值得肯定。李铎、王毅在《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古代文献信息化工程与古典文学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对话》,郑永晓在《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发表了《加快“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大数据”“云计算”理论与古典文学研究》,已经提出要突破简单利用语料库进行关键词检索和相关材料类聚的功能,并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来提升古典文学研究。

现阶段数字人文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数据库方法、计算语言学、社会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与文本挖掘等多个方面。这些技术方法可分别对应于古典诗歌分析系统的尝试、作家生平事迹研究、古典小说研究、文本与人物研究、文体与文论研究。数据库建设、技术创新运用与文本研究三位一体。数据库是基础,文本分析技术是关键,最终都要落实到发掘依靠阅读经验难以发现的文本组织特征及其相互关系,通过定量统计、定性分析,解决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疑而未决的作品归属、作品辨伪、异文辨析、修辞特色、风格生成、题材变迁、因革影响等方面的问题。

传统的文献材料彼此间呈现相对明显的线性关系,有相对完整和自洽的因果链。大数据时代面对的则是具有相关性的海量数据,几乎不可能找到每个数据之间的微观因果链。大数据时代不必非得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让数据自己发声。对以思想、情感和艺术为主体的古典文学学科而言,强调差异性、变异性和独特性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可能比因果性分析方法具有更强的判断力。

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使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极大地智能化、自动化。我们可以使用海量数据来实现复杂现象的数据刻画和说明。“全数据模式”将与问题相关的数据一网打尽,最大程度地规避客观条件局限所造成的以局部论全部的弊端,可以对问题进行更系统、更全面、更整体的刻画,从而使问题得到更精确、更彻底的解决。这是一种数据化带来的严格意义上的整体论,将使思维方式从还原性思维走向整体性思维。

历史与逻辑、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是人文社科研究的基本方法。大数据时代的研究尊重全体材料,重视量化分析,兼顾所有关系,这将有助于促进人文学科的研究由“解释性”向“求是性”转向。随着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数据化,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也能够实现数据化,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和数据建模来进行研究。这样,人文学科也就由以往被认作非科学的学科跻身于科学成员的大家庭中,进而发展出“人文科学”。

总之,大数据思维为人文社科研究的变革与创新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通讯与信息科学专业教授杰弗里·汉考克(Jeffrey T. Hancock)所说“这是社科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就好比显微镜的诞生对化学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新技术手段的应用需要充分依靠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专业技术。在古典文学领域尚缺乏此类专业技术力量的今天,这必然会促进学术研究人力资源的整合,倒逼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开展。但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和分析处理不可能完全交给机器,也就不可能完全交给技术专家。相反,从问题的设置到语料的选取,再到分析结果的解读、意义的阐释、体系的建构等,都将由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相关领域的高水平学者来完成。